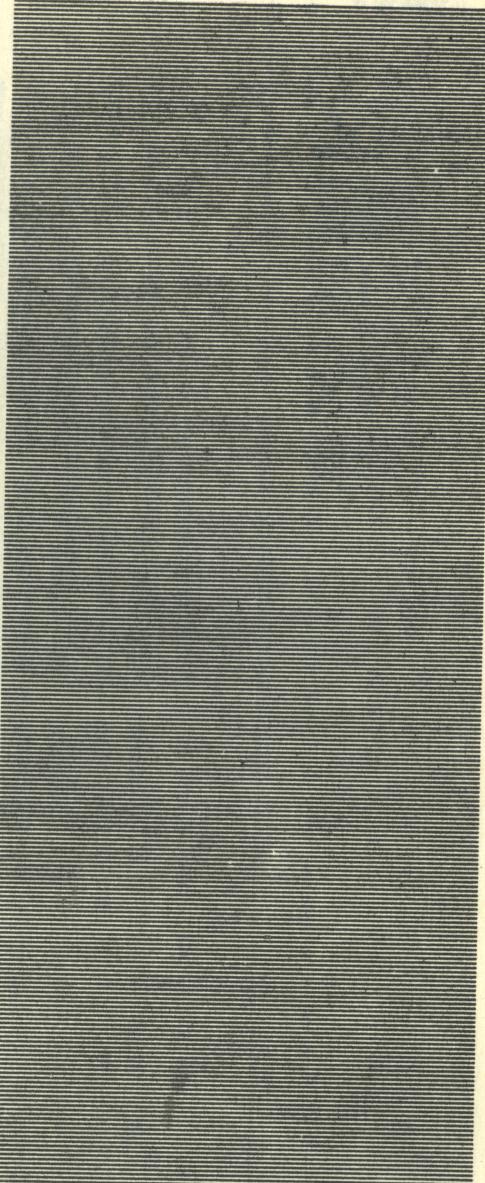


得以進入醫學院，是我感到最滿足的一件事。幾年來，每當我想起這類問題時，我就會不禁心懷感謝地感激上天給予我如此好的機會，使我能夠在醫學的領域中盡情地接受洗禮、盡情地遨遊，也讓我逐漸地明白人生的意義與責任；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令我心懷感謝呢？真的，上天賜給我太多太多了！自從有了這種想法之後，腦海中便一直盤桓著一個困擾，到底我該不該把這份心意吐露出來？是深深地埋藏在心中，抑或公諸於眾讓大家也能分享我的感受？經過這麼久的矛盾、衝突，終於下定決心——和各位共享我的樂趣吧！雖然我一直以為我的文筆實在是差勁到無法表達自己思緒的地步，也一直懷疑自己是否有這份能耐、資格做如此的嘗試。但又深恐這一贅住，恐怕以後會再也沒有那份勇氣，提筆寫下它；於是不揣淺陋地，開始了這一項嘗試——

高三下那年，為了填寫志願真是煞費周章，本來的第二志願填的是理學院（動物系），等一切都弄好之後，突



長成

仙董

大學生涯……放榜前幾天，情緒的緊張達到了極點，爲了“避難”，邀了幾位同學一同上橫貫公路去，梨山、大禹嶺、慈恩、洛韶、天祥沿途的風景，真使我幾乎忘記了一切塵務，然而愈接近花蓮，心理上的負荷也就愈重——還是無法拋開！狠下心腸，不聽收音機的報榜，翻來覆去好不容易才睡著，深夜却被收音機所吵醒，不知是那位仁兄開的，正想關掉，却聽到自己的名字傳入鼓膜；就在百感交集之中，我曉得了這個消息，於是，我進了北醫。

大一上，糊裡糊塗地過了一半，一天在本校某一份刊物上偶然看到這麼一則啓事：「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以武力打開中國門戶，從此中國開始步入世界舞台，不過，當然；自開始起，我們就是敞開著大門，不在象牙塔內，搞所謂的小集團，假如您對她的任一部門有興趣的話，我們十分歡迎您……」內心驕地起了一陣強烈的激盪，憑著這股「餘勇」，便報名參加了她——我生平第一個加入的社團，事實證明這一來可說是澈底地改變了我

參加過刊物工作的同學們相信都有過校對的經驗，如果有人問我對參加刊物編輯印象最深的爲何？我會毫不思索地回答：校對！雖然它是最痛苦的工作，可是却也是最值得懷念的。就好比成功嶺集訓對男同學而言是既辛苦而又最難忘的一個歷程，雖然匍匐前進、單兵戰鬥會使得大家苦不堪言，可是一旦由現在式變爲過去式時，便又開始回憶起來，而且每每成了”蓋“人的資料。記得曾經爲了校錯某篇大作三個字而遭作者痛罵一番，非常不幸地第二次又校漏了一個字，氣得那位仁兄聲言不再投稿某刊，爲此我會難過了好一陣子；可是一想起每次校對完，沒事時便坐在窗戶旁遠眺西門町的夜景的那段日子，或是幾個同學坐在一塊兒聊天，彼此不分年級、系別，那份熱絡的勁兒，不禁令我發出會心、滿足的微笑，甚至閉上眼睛都還能看到當時的情景歷歷如繪；那種感受、滋味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難怪有那麼多前輩會投身此中，儘管功課是那麼地繁重，也難怪綠杏這份刊物會辦得這麼好，個中奧妙盡在於此！

一年很快地過去了，又到了新舊交替的時候，一天有位學長跑來找我，要我接下一個社團，不自量力地竟答應了他，等發現自己實在不克勝任時已嫌太遲，只好硬著頭皮關下去了。本著「待人以至誠」和「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信念，居然沒有辜負那位學長的重託，可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不知有多少幕後英雄爲了她而犧牲一切却不爲人知，反倒是讓我坐享其成，每念及此，心中便悵然不已，久久不能釋懷。

Hippocrates—醫學之父，將醫學喻爲一齣有三個角色的戲劇，即病人、醫師和疾病。此即何以千百年來，醫學與文學會是那麼地息息相關的原因，因爲二者均關懷著人類的生命與憂患。Thomas S. ydenham，十七世紀一位偉大的醫生，當人家問他學醫要唸些什麼書時，他推薦

的竟是「唐·吉訶德」；毛姆似乎也曾勸初入醫門的人多看些文學作品。既是醫師也是作家的都德（Leon Daudet）認爲：「引導著觀念、思想改進衍化的兩大要素，一個是文學，另一個就是醫學。」而葉曙教授的「病理卅三年」中有這麼一段：「醫學專著以外，我還擁有數百本中、日、英、德小說，說也奇怪，雜書之中，竟以中文的爲最多，這是因爲身居外國，深恐把中文丟掉，……」（閒話研究 P.387 ~ 389）更是令我輩愧煞！積幾年來的經驗，深深覺得唸唸歷史書籍，雖不全然有鑑往知來之效用，却往往可使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有較客觀而深入的見解；不過在唸歷史的時候，我們所應該汲取的是其中的精神和意義，故事、情節不過是史家爲了便於敘述及增加吸引力的手段罷了。

歷史學家永不悲傷，因爲他了解：除非人能參與社會之中，否則人的生存將無意義可言，……。「摘自威爾·杜蘭（Will Durant）所著世界文明史之結論—歷史的教訓。」

常有同學聊起校內雖有不少學長不遺餘力地提倡醫學人文、醫學社會學的重要性，但是却深覺道途遙遠，又路分歧，不知由何開始才好，深以「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爲苦！對這些同學我實在感到欽佩。曾與一位老醫師討論應如何培養自己——對一個身爲醫學生的人而言，不意竟聽到這麼一句話，頗以爲然，他說：「開業行醫了將近三十年，愈來愈有學海浩瀚之感，對醫學不禁興起了一種敬畏的心情；的確，它是一門終身的事業（Medicine is a life-long profession），窮畢生精力也不見得就會有什麼收穫！所以必須持久不懈地充實自己，否則就要爲時代所拋棄了。」鑽得愈深就愈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在學校裏考試，寫錯了可以說：沒關係下次再來！然而一旦真正站在第一線上面對著病患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考完試之後

能曉得自己錯了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最怕的是犯了錯而尙渾然不知，那纔是大不幸哪（尤其是對患者而言）！有些同學一進了醫學院，便儼然一副醫學生的派頭，言行舉止在在都流露出一派「大家」的風範，對這些人的「泰然自若」我也常常感到佩服。不過個人以為自己才疏學淺，常不好意思向人談起我是個醫學院的學生！因為說實在的，即使唸到所謂的「高年級」，懂的也不過是一點點皮毛而已，打針都還會發抖哩！對一般小老百姓吹噓一番還沒啥問題，一旦“蓋”錯了人，碰上了武林高手，嘿嘿！那種滋味真是夠人瞧的。為了避免「龜腳」跑出來，還是安分守己些，其實，安分守己不算消極，相反的，倒有不少積極的意味在裏頭呢！惟有做事踏實些，方能祈許將來能有更大的力量來幫忙他人！對於如何著手去吸取醫學人文、社會等等知識，見仁見智，真是百家齊放、衆說紛陳；我想只要有心去涉獵，出發點既然是樣的，那麼即使途徑各異，終究會達到目的地的，諸位只需常常秉持著一顆“仁愛”的心去做，相信是不會差到那裏去的。不知這樣是否能令您滿意呢？我的朋友！

今天醫師的地位確實是不若往昔了，各位可以從十九世紀以來的文學著作中發現：醫師的地位一向是極崇高的，他們甚至被作家英雄化，成爲專與無知、墮落、邪惡作戰的大人物，他們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是熱心正義的化身。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在其作品“鄉下醫生”（Le Médecin de Campagne）中曾藉主人翁「培納西醫生」表達出他對人類社會所追求的理想，對善良天性的發掘，可見他對醫生神聖職責的崇敬；而他對自己在另一作品中所創造的Dr. Bianchon更是無法忘懷，臨終時竟然喊道：「現在只有Dr. Bianchon能救我了！」即使在日據時代乃至於光復初期，醫師在台灣社會上也是扮演著一份極重要的角色，並深受民衆的尊

重（請參閱綠杏十九期，老醫師的話：pp. 60—72；南杏十八期，醫生在台灣社會中的地位，日據時代的台灣醫師—台灣醫師在啓蒙運動上的角色：pp. 37—42）才不到三十年的工夫，醫師的崇高地位似乎已爲人們所漸漸遺忘了，中外皆然，雖然史懷哲、杜里、西格雷夫等人的逝世才不過是幾年前的事情（Dr.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事蹟見其所著“史懷哲自傳”，“非洲手記”，“Dr. Tom Dooley，事蹟見今日世界出版社所出之”一息尚存，“”，南亞華陀，“Dr. Gordon Seagrave, 1897—1965），見綠杏十八期，緬甸醫師：pp. 99—103）。甚至被人們指爲勢利、愛財的人物，投考醫學院的學子往往被人們以有色的眼光視之，醫學生的情況更糟！固然把「醫學商品化」的敗類不能說沒有，然而「一竹竿打翻一船的人」也不是該有的態度；仔細檢討起來，實在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一件事！

我們由於職業上的緣故，有機會更進一步地瞭解人類、更接近人群，原是件十分令人欣羨的事情，然而最近却有人提出醫學界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的問題，這是不是值得我們深思反省呢？促進醫學界與社會群衆間彼此的「容忍與瞭解」，似乎是吾儕今後所當努力的方向！您說是嗎？！

隋煬帝開鑿運河，原是爲了南遊江南之用，不想却成了南北交通的一條交通幹線；絲道原是爲了運絲方便而設的商業道路，結果却促成了東西文化的交流，差一點就改變了人類的歷史——若不是因爲帶路的土人偷懶，騙漢使甘英說：要抵達地中海的對岸還遠得很呢！以致半途折返，說不定今天的世界已不是這個樣子了！四大文明古國的發源都是位於大河的兩旁；於此可見河川、道路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有多大了。換個話題說，鳥需要巢，蜘蛛需要網，而人與人之間需要溝通！經過幾千萬年的演化，在文字歷

史上從來就沒聽說過有“彼此溝通”的困難與需要。按理說，時代業已進步到太空時代了，登陸月球已經不算新聞，而遠在一百年前，法國的小說家席勒·威恩的作品「環遊世界八十天」中，那個「最快的人」福格先生，曾以二萬英鎊與人打賭，誇口他能在八十天內環遊世界一周，憑著「高速交通工具」——火車和輪船。在他的時間表裏，由紐約橫渡大西洋到倫敦需要九天，今天噴射機可以在幾個小時內便完成這項任務；科學的進步已使得時空的距離大為縮短，何以這原以為不成問題的事情反倒成了問題呢？我想原因就在於時代的衍進超過以往的速度，使得人們無法適應此一社會結構的驟變，不得不建立起一道圍牆來防備他人以保護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尤其愈是渴望與人交通而無法如願時，愈是掩飾得厲害。好比初生嬰兒的肺是鮮紅色的，中年時成了灰色的，到老年時竟然成了黑色的（吸煙者尤然），最後就如心包膜（Pericardium）一樣韌到無法用稍鈍些的刀子割開的地步，可怕乎？必須有些先鋒率先來革除此種心理！即使是最勇猛如Achilles者，都有辦法打敗（即著名的Achilles' tendon），難道就沒有一點法子來對付它嗎？有！——誠。

我常心存感謝。因為說實在的，自己是一個後知後覺的人，可是很幸運的是：每當我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總會出現一、兩個人來指點迷津，其中又以傅岳兄和世澤兄兩位學長對我的影響最大，儘管他們並不一定曉得，可是他們的出現確實使得我的大學生涯起了一陣很激烈的改變，他們的風範、境界是永遠沒法子達到的，然而我却願意努力地盡我的力量去效法，雖然他們已經離開校園，不再那麼容易常常見到！我也很慶幸進了北醫能學到這麼多的東西，因為這種磨練的機會實在太難得了；對於我所會參加過的兩個社團，更是感到刻骨銘心，那份感情實在是太深厚了，相信他人是很難以理解的！

胡適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中曾經說：「幾個學院以上才可稱大學，簡直是無謂之爭，……最重要的是學術風氣、專長人才的培養！」並以奠定了美國學術獨立風氣的前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長吉爾曼（D.C. Gilman）為例，說明了他的計劃與理想。一八七五年，吉爾曼接受了甫成立的霍浦金斯大學校長的任務，他認為：「無論何地，一個大學的效率，不靠校舍，不靠儀器，只靠教員的多寡好壞。」於是花了一年工夫去尋訪人才，終於聘到許多名教授，包括後來對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乃至美國醫學教育有極大貢獻與影響的威爾瞿（Wm. H. Welch）、奧斯勒（Wm. Osler）、哈斯提德（Wm. S. Halsted）、及凱利（H. A. Kelly）等人，而他對此醫學院的要求是：「把醫學教育建立在一個真正的大學基礎上！」事實證明，這項在當時被人認為苛刻得不合理的條件，不但建立了霍浦金斯醫學院在美國醫學界的地位，還促成了美國醫學教育的重大改革，影響所及之深遠，足與佛克斯納氏的報告（Flexner's Reports）（醫學教育改革計劃報告）媲美！其他學院也同樣是辦得有聲有色。在他七十大壽及霍大廿五週年的慶祝會上，霍大校友及教授致贈給他的賀壽文（由後來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教授執筆所撰）裡寫道：「傑佛遜定下了美國大學的規模，但您老先生是第一個人，建立一種新的大學。」（原文見霍大廿五週年紀念刊）由於他，使霍大開學不到一百年的今天，美國成了全世界學術研究的中心！

但願在有生之年，我能見到第二個吉爾曼的出現——爲北醫，爲中國醫學界而努力、而奮鬥，各位，那第二個吉爾曼，說不定就是您哪！所以，加油吧！北醫人！

以上是我的一點感想，不過很抱歉貨色不好，然因年關已屆，債主上門直到今天才不顧一切地強迫推銷，希望您不要見怪！